

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

——中央河南调查组“长葛调查”追忆和启示

本报记者 邓雷 杨红卫 王金伟

编者按

1961年4月10日至8月22日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率领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,长驻长葛135天,展开深入调查,探索破局之策,其调查之扎实、作风之朴实前所未见,充分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务实担当精神。

习仲勋,这位被毛泽东主席称为“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”夙夜在公,告诫中央工作组一行“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”,并躬身自行、率先垂范,他的长葛调查堪称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,对当前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极具启迪意义。

近期,本报记者专程回访了中央河南调查组“长葛调查”见证者李喜木、冯文献、王丙坤等,追忆习仲勋敢作敢为、救世济民的工作轨迹,感受他心系群众、亲民爱民的人格风范和担当精神。

62年前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率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长驻长葛135天,展开深入调查,探求发展之策;

62年后的今天,中央再次发出“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”的号令,让1961年习仲勋在长葛开展的这次“不唯上、不唯书、只唯实”的经典调查,更显弥足珍贵。

3月25日上午,记者走进位于长葛市区八七路的“中央河南调查组”旧址,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映入眼帘,不禁让人勾起回忆和沉思;一件件老旧的办公用品,娓娓诉说着至深的调查往事;一个个图文并茂呈现出来的故事宛如时光画卷,记录着“中央河南调查组”在长葛4个多月蹲点调查的点点滴滴……

回溯时光,触摸历史;素墙红瓦,风过留香。驻在那幅“1961年5月习仲勋在长葛县调研期间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影”的黑白照片前,分外亲切。正是这幅照片,将我们的采访引向了那一场影响深远的“长葛调查”。

追忆篇

习仲勋在长葛怎么做调查

调查进展不顺——“出了问题我负责。”

事情还要从1960年说起。

国事艰难,民生维艰,如何从容走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造成的困局?1960年12月,中共中央下发《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》等,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。

带着一系列问题,1961年4月10日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率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,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、赵守攻,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,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,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、田方等12位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组,来到“五风”(“官僚主义、强迫命令、瞎指挥、浮夸风、共产风”等五股风)典型的长葛,展开蹲点调查。

来到长葛的第一天,习仲勋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,随即决定:由县委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,到存在问题多、情况复杂、离县委机关最近、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和尚桥公社宗寨、樊楼、杜村寺等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。

4月11日,习仲勋带领曾一凡、侯亢和秘书长张云,在张继增的陪同下步行数里来到宗寨,党支部书记赵宪章、副书记刘水柱等出来相迎。

起初,调查很不顺利。在赵宪章家,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,村干部面面相觑很是尴尬:县领导在眼前,敢说实话吗?

习仲勋再三鼓励:“出了问题我负责。”气氛慢慢缓和,村干部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:在“一平二调”的“共产风”下,宗寨大队小队大队,小村并大村,大村“割耳朵”(不要小自然村)——发现规模过大,管不过来,又把村子分开,重新合并,瞎折腾。

分分合合中,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,817个劳动力被调走356个。另外,调走粮食10万斤、树木3260棵、麦秸7万斤。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,还没解捆,就被调走炼了钢铁。农民群众的牲畜、家禽、盆盆罐罐,甚至房屋,都被“一大二公”了。副业、手工业也被“五风”全给吹走了。谁想不通不服从,就会被“拔白旗”“拔毒气”(揪斗)。“站起干,坐下辩;通了干,不通辩”——“大辩论”中,人只往中间一站,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,拳打脚踢,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。批斗的人,轮番睡觉;挨斗的人,一点也不能睡,这叫“熬鹰”。三天三夜不合眼,再硬的身子都撑不下去。农民、干部一个个屈服了:放弃了对土地、农具、耕牛、家具、用具的拥有权。

赵宪章、刘水柱等大队干部还向习仲勋反映: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,大办公食堂由起初“吃饱肚子”不要粮票,到每人每天五两到九两(十六两秤)的粮食标准,再经过出库关、磨面关、管理关、炊事关、打饭关、照顾关等,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,四两到五两就顶上了天。说是要“瓜菜代”,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,榆树皮都被吃光了。群众严重营养不良,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,小孩儿面如菜色。

公共食堂缺燃料,烧完了树木烧农具,烧完了农具烧家具,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,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。还有,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,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。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,为了活路,还不得不拉车、拉犁、推石磨。没有牲畜、家禽,就没有肥料。种地不上粪,等于瞎胡混,粮食还得大减产。

正是在习仲勋的鼓励下,村干部和农民群众慢慢敞开心扉,说出了存在的矛盾,为以后解决问题打下了基础。

发现粮囤作假——“无颜吃农家的饭。”

1961年4月16日,习仲勋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,调查群众的口粮问题,并要亲眼看看粮囤。

党支部副书记张大力一听“看粮囤”,吓得话都说不囫圇了。搪塞不过去,他只好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。

库里,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。村里,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。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?习仲勋很是怀疑,让打开粮囤,张大力死活不肯动手。习仲勋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,发现粮囤里,竹竿片撑了个拱,布罩在拱上;布上边,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。

习仲勋又气又恼:“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‘多快好省’学精了,用妙了!一个粮囤,如果用土填满,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。这下子好了,半个小时,就能把假给造出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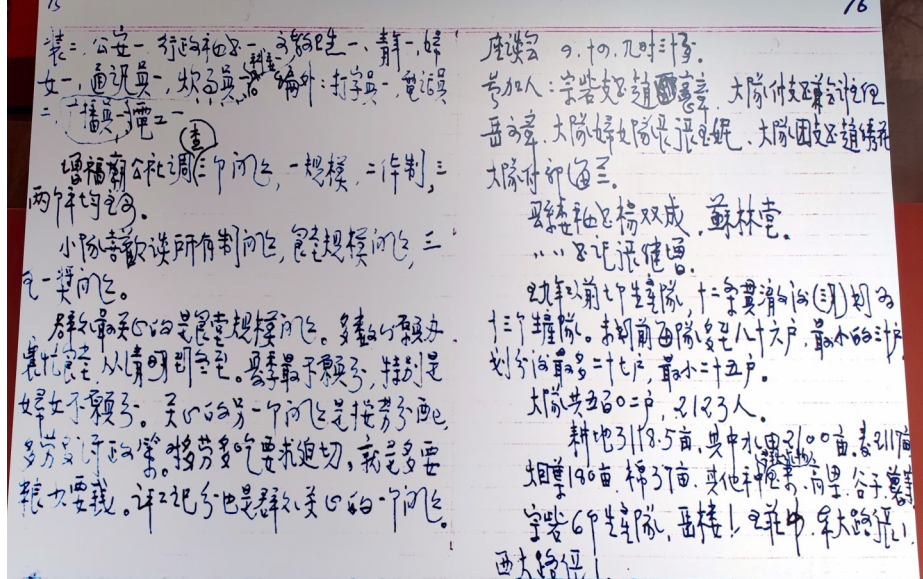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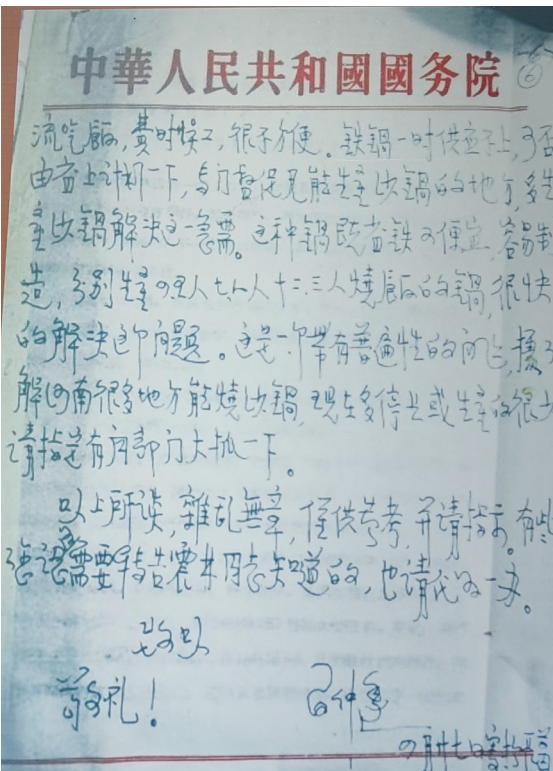
张大力满腹委屈:“不瞒习副总理,庐山会议后这里到处都在搞‘卫星田’。上面瞎指挥,种麦每亩地播种几十斤,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,麦子产量连种子都顾不住。可吹产量,一个比一个高。吹完了,听完了,上边还要装模

↑1961年5月,习仲勋(前排左五)在长葛县调查期间与当地干部群众合影。

←习仲勋写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信。

↓习仲勋在长葛工作时的调研记录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

担当篇

习仲勋在长葛如何“查风纠偏”

入户走村,聆听群众疾苦;解散食堂,顺应群众呼声;开仓放粮,急群众之所急……

长葛调查期间,习仲勋不仅先后向党中央呈交10多份调查报告,如《长葛县秋收生产和群众生活及粮食的情况》《河南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》《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粮食问题的调查》《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调查》等报告。

在这135个日夜里,习仲勋先后向中央提交11份调查报告,系统地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、保护农村劳动力、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制度、调整社队规模、改进干部作风、顺应市场规律、包产到户经营、群众路线教育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,为我国农村工作的后续政策调整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。

“开仓放粮”

1961年,旱情一直在持续,麦子大面积枯萎。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同乡亲们一道,奋力抗旱,争取不让夏粮绝收。

没承想,麦收后却迎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: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,超购289万斤。如此一来,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,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两。

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,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议,研究退库和统销(返粮)的问题。

会上,习仲勋还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(那个时候,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是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)。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,说:“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,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;没有中央批准,一粒都不能动。”

在座的都听出了这话的意思,都将眼睛盯向了习仲勋。

习仲勋果敢地说:“特殊情况下,要采取特殊措施。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。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,等于向国家‘预借’,下年丰收,再补上。”

会议室里,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,无人发言。

说得轻巧,能“预借”吗?说是“补上”,“补上”就完事了吗?看到这场面,习仲勋思考片刻,拍板决定:“县委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。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和国务院,向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请示。他们会考虑问题的严重性,给予破例。”

《长葛粮食志》记载:“县决定退库(小麦)60万斤,统销341万斤,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、机动粮135万斤……(下转第四版)”

跟群众打成一片——“无论走到哪儿,身份不用保密。”

习仲勋要求随行工作组人员放下架子,与群众打成一片,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。

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,依照规定,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。习仲勋虽然衣着朴素,但他的口音与当地干部、保卫人员随行左右,走村入户调查时,不免为百姓所注目。

习仲勋叮嘱随行人员:“无论走到哪儿,身份不用保密,就说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。这说明中央政府对长葛人民很关心,帮助长葛工作,有何不好?”

他还要求工作组人员:“下去搞调查研究,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。只有几里的路程,不要坐汽车,也不要骑自行车,步行去最好。”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:“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。机关放电影,要和同志们一起看,不要事和事和群众划界限。”

“习仲勋去宗寨、王庄、杜村寺、樊楼等地调查时,总是步行。”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水柱时常陪同习仲勋到各村了解情况,他回忆说,当时,老百姓都拿这个大干部不当干部,有时还调侃他:“老习,你这个‘习’跟毛主席的‘席’差多远?”习仲勋笑笑,说:“我只是咱炕上铺的‘席(习)’,跟铺天盖地的毛主席的‘席’是两码子事儿。”

还有一件事,让长葛人冯国富永生难忘。1961年夏季,13岁的冯国富一直高烧不退,家里没钱看病,只有等死。后来,冯国富连夜被送进了医院。

原来,有人将这事儿报告给习仲勋。在习仲勋指示下,医院还给冯国富用了救命的西药。“我出院时,医生指着一竹篮子青霉素、链霉素空瓶说:‘你的命真大。’”冯国富回忆道,“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,我们一家永远记